

## 骏马奖作家观察(一)



满族作家马伯庸擅长以微观的历史视角重新架构宏大的历史叙事,在历史的裂隙中寻惊雷、见温度。2024年,他的长篇小说《大医》获得了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长篇小说奖,虽然这部小说在题材和写法上,看似与他在《风起陇西》《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等作品中惯常偏爱的古代题材和悬疑风格不同,但却可以说更鲜明地整合和总结了他在此前创作中形成的文学价值观,那就是不仅仅徘徊于时间、地理、族属等表面角度,更在平等的叙事视野中拉平个体与宏大叙事之间的价值鸿沟,在日常生命体验中重构宏大叙事。从《风起陇西》《长安十二时辰》到《大医》,再到新作《食南之徒》,我们可以对马伯庸的整体创作风格、文化特征和文学史观进行一次全面梳理。

## 文化乡愁和人性底色:民族融合的内在驱动力

纵观马伯庸的历史题材创作,可以发现他最擅长写民族大融合时期。从《风起陇西》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长安十二时辰》《长安的荔枝》的天宝大唐,再到《食南之徒》的汉武帝时期,他对民族大融合的内在逻辑有其独到的观察视角和叙事切入点。

《食南之徒》看似在写一个“吃货”因美食阴差阳错化解朝堂阴谋的故事,实则从“同食同种”这一最能性的角度,解答了中华民族缘何成为一个共同体,对民族融合的内在驱动力进行了重新叙述。《食南之徒》的故事基础来自于《史记·西南夷列传》,讲的是汉武帝收复南越国的故事。而写作这个故事“由头”,来自博物馆里的一次意外发现:他在广州南越王博物院看到两枚从南越王官水并里出土的竹筒,上书“壶枣一木”,但南方不产枣树,枣从哪里来呢?原来南越王赵佗本是北方人,秦末大乱时南渡立国,后思乡心切,于是在南方种植北方家乡的枣树,以解乡愁。食物是最公共也最私密的事情,相同的饮食基础、趋同的生活习惯形成了最根本的身份认同,故乡的食物满足的不仅是口腹之欲,更联结着过去和未来。食物的乡愁,就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根、最初的源。

事实上,赵佗一生一心向汉,汉武帝之所以能够收复南越,吃货唐蒙通过“蜀枸酱”探破赵佗被毒害背后的秘辛只是文本的偶然,背后中原与南越之间无法割舍的情感勾连、共通的生活方式和恒久的文化乡愁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向心力,才是历史的必然。

从《长安的荔枝》到《食南之徒》,马伯庸写食物,归根结底写的是文化乡愁,是人性最本真层面的相通性。无论是万人之上的太子朱瞻基,还是长安末流小吏李善德,甚至是已经成仙

的太白金星李长庚,面对他们天殊地别的身分差异,作者有一双善于发现其共通的生命处境的眼睛。尤其是在处理历史大进程冲突点时,马伯庸从未粗暴地归因于差异性和仇恨对立,而是在不同族别的共同遭遇中发现和珍视其共通性——随着《长安十二时辰》中袭击长安城的阴谋被层层拨开,读者发现张小敬、突厥狼卫曹破延、“蚩蚩”首领龙波的命运和经历竟然如此相似,他们的悲剧都共同捆绑于边境无休止的战争之上。当十二时辰落幕,原本处于对立的这些人物在精神空间上却完成了一场惺惺相惜的相互救赎,而他们人性深处的情感底色和对和平的共同追求,正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

## 微观历史视角下的共同价值书写

马伯庸的作品擅长以独特新奇的视角重构一段熟悉的历史叙事,从而打破常识性的认知。无论是从太白金星视角重新理解《西游记》的太白金星有点烦,还是从底层小卒视角重新审视大唐盛衰转变的《长安十二时辰》,“去中心化”的视角一直贯穿着马伯庸的创作。他似乎一直在试图解构某种习以为常的“二元对立”。在《两京十五日》中,这种对二元对立的解构被推向极致,大明太子朱瞻基在一场阴谋阳差之下不得不隐身为普通人中完成一场千里狂奔,高高在上的皇帝与大运河上的纤夫二者间的视角被拉平,皇权与民意、崇高与卑微、宏大与日常,都被置于一个公允的文本空间之中。与《明朝那些事儿》不同的是,历史人物在《两京十五日》中并没有获得比虚构人物更大的文本优先级,反而是朱瞻基常常受制于主观成见,或被现实迷雾所蒙蔽。与那些虚构的小人物相比,他反而成为了历史的近视者或盲视者。马伯庸在去中心化的同时,也去除了很多基于历史文本的文学书写普遍存在的“虚构焦虑”,当然也没有沦为“戏说”,最终又回到了历史主线上。

《大医》与其说是“去中心化”,不如称其为对“多中心化”叙述视角的一种尝试。马伯庸几乎彻底抛开历史大事件的中心人物,故事中并没有绝对的主角,只从人“向死而生”的本能出发,珍视每一个小人物,经由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最终抵达人性的深处。

虽然马伯庸的创作一直以来并没有浓烈的民族风格,但他擅长从边缘切入,“去中心化”的叙述视角,或许与他的身份意识和独特的民族视角分不开。在文学史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无论是写湘西的沈从文,还是写《正红旗下的老舍》等等,这些少数民族作家似乎对不同形态故事背后普遍和共同的人性更有感知力,更有可能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深入探索和展现人类最深层次的共通情感和体验。从这

## 历史视角下的人性显微

——马伯庸创作论

□杨一丹

正是在一次次对历史的“显微”中,一个个小人物承载起民族自新的政治与文化使命,文本得以从对个体生命的观照抵达宏大叙事,最终实现了个体与民族、文学与生命的辩证与互动



《大医·破晓篇》,马伯庸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

《大医·日出篇》,马伯庸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12月



个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作家对人类共同情感的挖掘既是独到深刻的,又是极具总体性和普遍性的。

纵观《江格尔》《格萨尔》《玛纳斯》三大史诗,其中的文化精神可以说早已超越了族别差异,可见民族文学从其本源上就是紧紧围绕着天下、仁爱、责任这些中华文化的共同价值观而衍生的。这种对人类普遍情感的深刻洞察,在《大医》中得到了集中呈现。红十字会医生“人道、公正、中立”、不分阵营、一体救护的原则,正是人类共同情感的集中体现。也正是有赖于此,大医们才得以守护了国运走向,守护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大医》作为少数民族作家书写的文学,超越了族别、国别和种人的差异,成为观照人类共同命运的寓言诗,这正是《大医》最可贵之处。

而到了《食南之徒》,中华文化的共同价值观又通过“食物”这一更日常的视角得以呈现——从生命到生活,在超越特定的民族性之后,反而更加深入地抵达了中华民族总体性的共同记忆和共同价值。

## 个体与民族、文学与生命的辩证互动

《大医》并不是马伯庸第一次触及医者主题,出版于2017年的《白蛇闻医录》虽然基于玄幻想象,但“医者一瘟疫一苍生”的关系却是对社会关系的投射,构建消弭瘟疫、人妖和谐的幻

想世界,事实上也是一种隐喻。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叙述中,医者常常与“救国”“济世”的宏大理想紧密相连,传统医学也不仅是治疗之“术”,而是涵盖中国传统哲学观、价值观、生死观的综合之“道”。“不为良相即良医”的传统士大夫观念和救死扶伤的身份想象,使得“医者”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自然地承担起了匡时救世的“英雄”隐喻。尤其是晚清以来,面对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文学叙述更加强化了对医者的政治和社会期待,将其作为承载中国传统“上医治国”理想的化身。晚清刘鹗的《老残游记》便将诊断千疮百孔的古老中国的“病相”和“病因”的使命赋予了主人公游医老残,他代表了洋务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现代文明审视和改造中国的期待;迟子建的小说《白雪乌鸦》中,领导了东北鼠疫防控、使人类避免了一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的伍连德,也同样遏制了日俄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此呈现了其“国医”的双重身份和使命。总而言之,在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中,医者所诊治的对象既是具体的,更是象征性、寓言性和文化性的。

《大医》是马伯庸首次触及晚清民国这一时段的历史。在文学史中,鲁迅、郭沫若等作家“弃医从文”的故事太过为人熟知,因此他们“从文”之前的救国理想常常为文学史所忽略,《大医》填补的恰恰正是这样一段历史空白。文学与医学最根本的关注点都在于人和生命,二者底层逻辑的共通性正是其常常被相提并论的根本原因。不少人认为鲁迅从“择医”到“从文”的



《食南之徒》,马伯庸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4月



《长安的荔枝》,马伯庸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10月



过程似乎暗含了后者对前者的否定,实则不然,医学在生命政治层面对民族的现代性转型意义重大,精神与肉体的现代性也必然是同源同构的。鲁迅从未否认过医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必要性,更何况后者的本体性地位无可取代——“家国”从来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由一条条鲜活的生命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方三响、孙希、姚燕子这三个出身各异的青年医生的成长史,正是对从晚清到新中国的国家和民族成长史的一种隐喻。

文学中的疾病叙事常常与民族的自新时刻相联系,薄伽丘的《十日谈》、笛福的《瘟疫年记》、加缪的《鼠疫》和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都诞生于人类与未知的死亡恐惧相抗衡的语境之下,动荡背景下的瘟疫和疾病正是民族苦难和时代悲涛汹涌的隐喻。然而疾病、瘟疫、战争这些毁灭性的语境,也正是重新积蓄“生”的力量之出口。

可以说,医者与社会之间见微知著的隐喻关系,完美契合了马伯庸一贯善用的微观视角,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显微镜下的大明》。何为“显微镜”?即是“替那些生于尘埃、死于无闻的蝼蚁之辈作传,转述他们湮没于宏大历史中的声音,找到去除基层社会积弊的关键所在”——正是在一次次对历史的“显微”中,一个个小人物承载起民族自新的政治与文化使命,文本得以从对个体生命的观照抵达宏大叙事,最终实现了个体与民族、文学与生命的辩证与互动。(作者系天津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 弦河诗歌中的生命意识

□龙潜沈欢

弦河是出生于贵州的仡佬族诗人,那里有莽莽山海,风在树梢歌唱。弦河早早踏入社会,在经历过生活的洗礼后,他开始从文学层面思考生命的意义,思考生与死的关系,追求对生命更高层次的理解。他的诗歌远观起来敏感纯净,细察之下有热情和生命力蕴伏其间。缠绕处常流露隐秘忧伤,克制的叙述背后俨然有波光潋滟。他以不易觉察的方式靠近人类的内心,唤醒我们关于温暖的朴素回忆。

弦河的生命意识,使他能超越日常琐碎,审视生命的广阔维度。“殊途同归的轨迹/从遥远的时光中捎来书信/我的存在是否只是/长河搁浅的容器?”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是否只是微不足道的存在,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和冲刷?那些漂泊的人生,在诗人面对新的价值抉择时,悄然转化为一种危机意识。诗人剖析自己的内心世界,努力进行自我探索与反思。他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被某个问题困扰,希望以诗歌形式的揭示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独特的生命体验,促使弦河在笔端构建了一个不甘就范的抗争者形象。生命中无法回避的困境,也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可以促使人成长,让人在逆境中找到希望,进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拥抱生命。在追寻生命的过程中,诗人时常会被失意的情绪笼罩,但他从未止步不前,而是以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向读者展现了他对生命价值的执着追求。他在很多诗中都表达了这样的想法:逃避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有勇敢面

对困难与挑战,坦然接受成长过程中刀子插在身上的疼痛,才能使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才能走出生活的困境。

“我的生命是断节的/埋在土里时/只想着发芽/发芽了又想着开花/开花了又想着结果/结果了又想着/种子会落向哪。”诗歌传递出的是生命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从埋在土里到发芽、开花、结果,每个阶段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共同构成生命的完整过程。在追求理想生命形态的过程中,弦河敢于将目光投向死亡。在弦河笔下,生命的形态既有激昂向上的“生”,又有泰然自若的“死”。“出门的时候,哪里啦啦的鞭炮声/一响接着一响/比出生时的啼哭喧哗。”这是一种生与死的对立,原本象征欢乐与喜庆的鞭炮,在此刻的送葬仪式上承载了太多悲伤。弦河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与婴儿初临人世的清脆啼哭相提并论,直接引出他想要表达的生死观,即对生命起源的敬畏和对生命归宿的尊重。

从哲学层面看,生与死是对立统一的,二者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存在的必然形态。弦河以自己生命的见解,表达了对生命的热爱与追求。“在这片土地上,我成为父亲的时候,父亲又成了孩子。”家庭角色的转换,诠释了生命循环的内涵。“我”、父亲与孩子构成了时间、生命、传承、变迁的宏大叙事,隐喻了一个人的一生。这里的“生”不仅是生命的诞生,更是生命状态的不断更新和转变,“死”也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旧有状态的消逝和新开始的孕育。

现代社会,人往往在孤独的旅程中向内心探索,寻求源自内心深处力量。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在试图摆脱对外界既定价值的依赖,勇敢展现自我的存在意义。随着自我的觉醒,一系列精神上的挑战悄然到来,它们源自自我认知的迷茫、价值判断的困惑和未来道路的不确定,这些挑战使弦河更加深入地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实现心灵的成长。正如其诗中所写,他要寻找“一座完全属于我的花园”,这里的“花园”指弦河内心的理想世界,也指弦河对归属感的渴望。

当对生命的深切呼唤进入到潜意识深处,它便以一种强烈而纯粹的形式在爱情中得以体现。对“爱”的渴望被无限放大,人们希望在爱情中弥补过往的缺失。“想在西湖/遇见一个一见就心动的女子/她为我而来/所有的欢喜应该是/你站在她面前/你就知道要去向哪里。”这首诗洋溢着对浪漫邂逅的憧憬和对纯粹爱情的渴望。西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情圣地,弦河渴望在这充满诗意的湖畔遇见让他一见倾心的女子,诗中蕴含着弦河对爱情与人生目标的双重寄托。而在深思熟虑后,诗人将个人激情转化为更为深沉内敛的力量。弦河怀着一颗真挚澄澈的心,以诗歌的方式讲述对理想的顽强坚守,宛若一条记忆的河流,历经波折而不失壮美。

(龙潜系贵州民族大学西南文化研究院院长,沈欢系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 《厚土生金》:八桂大地的壮阔报告

□钱志富

南中国广西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广西壮族作家黄鹏的报告文学作品《厚土生金》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收录有《来的路》《阅读跨越》《螺蛳粉香》等报告文学作品28篇。作品集呈现了八桂大地波澜壮阔的历史样态,展现出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以来八桂大地经历的巨变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在读者眼中呈现出一片具有悠久历史文化、英雄辈出、人杰地灵的八桂福地。

在《行走花山》等篇章中,黄鹏深情描绘了花山岩画的丰富魅力。透过这些作品,读者能看到在广西这片美丽而神奇的大地之上,曾经活跃着古老而智慧的路越族人,这些勤劳的人民生活富足,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花山岩画文明。他们生活着、开拓着、创造着、镌刻和书写着自己的思想、理想和追求,留下他们的印记。《远去的永平寨》《阅读跨越》等篇章涉及广西的历史人物,如宋仁宗年间跟随狄青来广西平定叛乱英雄黄善璋、英勇善战的女英雄瓦氏夫人等。历史上的广西,各民族富有智慧、英勇善战,是一个英雄辈出之地。

阅读黄鹏的文字,总能感到一种强烈的历史纵深感和地域的辽阔感。他的文字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穿透历史和地域,从远古扫视到当下,与眼前光景紧密联系在一起。《鹿鸣洛清》《遇见黔江》《螺蛳粉香》等篇直接刻画现实,对眼前景的描写十分引人入胜。黄鹏是八桂大地新时代跨越式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他欣喜地将发生在广西的巨变诉诸笔端。

《鹿鸣洛清》中写了位于骆清山谷深处的鹿苑。作者看到牧鹿姑娘把鹿放出来,几十只梅花鹿蜂拥而出,看见来访者手中有食物便簇拥过来,毫不胆怯地吃他们手中的玉米粒。他一边喂鹿一边走,五六只鹿跟随着,直至手中玉米粒被它们吃完也不肯离开。作者看着身边的鹿,抚摸着鹿的头,听着鹿的叫声,恍惚中有种身处仙境之感,日常的俗尘垢念消失殆尽,心中剩下一腔澄明洁净,而这种感觉也直接传递给了读者。

《遇见黔江》中,黄鹏不仅活色生香地刻画了眼前景,而且从思想上升华开去。望着眼前的黔

江,走在建设工地上,踏在庞大坚硬的坝身,看着忙碌的建设者们,作者不由得生出感慨。人类运用智慧去征服和改造自然,但随着时间推移,最终的结局必然是自然还是原本的自然,而人类却不是原来的人类。由此,黄鹏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必须要正确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均衡发展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这样才能与自然和谐共生,享受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从《厚土生金》的诸多篇目中,读者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爱,一种对八桂大地壮阔山河的爱。因为这种爱,作者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探寻、去挖掘、去总结,随之升华出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激越人心的现实感。对地域的爱发展成对祖国广阔的爱,发展成对华夏民族的爱。

《厚土生金》中不仅有爱和历史,还有诗。黄鹏毕竟是诗人,读者在《诗意漓江》中能感觉到漓江一年四季展现给人们的诗意。春天的漓江犹如一首舒缓的抒情诗,暖风以温婉的抚摸,悄悄融化积雪,收拾寒冷,阳光用鲜活的双手,把满山遍野的生命一瓣瓣打开,细雨用绵绵的柔情,把草地的裙裾染绿,小鸟以欢快的歌唱,催开了含苞的花蕾,蝴蝶用扇动的翅羽,把封存了一冬的心愿放飞在漓江两岸。春天的漓江,勃发着生命的力量,流淌着理想的希望。

厚土生金,广西虽然地处祖国边陲,但它山河壮阔,历史文化灿烂,既有智慧英勇的人民,又有丰富辉煌的文明。黄鹏用“厚土生金”作为作品集的名称,实在是恰当的,寓意是深刻的。或许,可以这样去理解:承载着多民族团结和谐、生生不息气象的八桂大地,就是蕴藏和展现新时代精气神的厚土;作者对八桂大地的爱,对八桂大地壮阔山河及灿烂文化的爱,也是一种厚土。在这涌动多民族文化血脉的厚土里,必然会生出金子般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风貌和时代气象。黄鹏充满感情的文字因爱而生,果然厚土生金矣。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副教授)